

中国古代文学

分析语释论

张木苓
柳滨生 编著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1452

张木苓
柳滨生 编著

中国古代文学分析法略论

教师教育
继续用书
中学继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月·大连

(辽)新登字11号

内 容 提 要

该专著结合中学古代文学分析教学实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的文学分析法,借鉴、吸收中外现当代文学分析法,就中学语文古代文学十个方面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该书内容富赡新颖,引证赅备,材料翔实。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反映了国内古代文学分析教学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是一本开拓性的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研究班的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分析法略论

张木苓 柳滨生 编著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发行

大连船舶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76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吴德升 封面设计:柳林 封面题字:董 凝

印数 0001—2300

定价:5.50元

ISBN 7—5632—0358—3/I·10

前 言

本书是为教育学院中文系中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国古代文学分析法”课编写的教材；它还可以作各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师生和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用书。

从全国范围看，教育学院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将同时存在，但其重点将逐步转向继续教育，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一些省市教育学院来说，继续教育不仅提到教育教学的日程上来，而且迫在眉睫。继续教育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教育教学工作，迄今尚无一部完整教材公诸于世；也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探讨、研究并试编教材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笔者自知学识浅陋，但是，愿在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建设大厦奠基时，投下一颗微不足道的石块、一块砖头，以期引出美玉，不日可看到雕梁画栋，呈现异彩。

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任务，在于把他们在大学中文系所学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看作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其中各个对象，即各子系统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使不同层次的系统得到控制和调节，保证系统由散乱无序的状态向时、空结构上的有序性发展，探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整

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相关性诸原则，使之宏观把握、综合运用到中学古代文学教学中去，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鉴赏能力。因此，除补充、扩展、更新专业知识外，还应探讨、研究由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教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自然也是如此。

本书就是结合中学古代文学教学实践，面向中学语文教师，以中学语文课本选录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几乎涉及初、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全部古代文学作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分析法，借鉴、吸收中外现当代新的文学分析法，以便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古代文学分析教学的能力；试图解决中国古代文学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分析教学方法，是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本书共九章，另附“文体分析”一章。第一章“知人论世在中国古代文学分析中的作用”，笔者强调“知人论世”，具体分析，依据作品的时代特征，挖掘文本内蕴，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指出历史知识在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中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既诉诸特定的历史知识，又依赖于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的分析。第二章“内容和形式美的分析”，批判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机械割裂倾向，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同一性”，“形式就是现象的规律”（黑格尔语）；深刻理解文学作品内容的两层意义，内形式向外形式升华，才使作品获得物质的外壳，内形式既影响作品内容的鲜明、深化，也影响外形式的和谐、完美。第九章“比较分析”，非是“比较文学”的概念，而是在对古代文学的分析中运用比较方法，引导学生在

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讨论、争辩，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智力和分析论辩能力。末后附录“文体分析”一章，重点介绍古代诗、文两类文体，它既不是文体概论，也不是文体史；只是结合中学古代文学教材，按文体发展的轨迹，进行带有文体特点的分析，以求获得文体特征的认识，为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具体作品的的能力服务。因此，中学语文课本未涉及的文体类别，或虽涉及，但笔者认为并不重要，且篇数甚微，也就略而未谈。除上述四章，本书中间六章，则主要侧重对古代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的分析，这是本书一个明显的特点，如对语言、结构、时空、虚实、疏密、意境等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不应总在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和思想性、写作特点等公式化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而是应该努力去发现和分析古代作家运用艺术表现手法建构文章的能力，如运用文学语言、组织结构、塑造形象、创造意境等以体现作者的艺术构思、布局谋篇，从而创造出“第二现实”的艺术世界和它显示的作家情思。实际上，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的承担者是它的艺术形式，它是人们审美形态的凝固物，是人们审美理想的物象化。由于人们觉得它美，便逐渐获得相对独立的意义。例如作为符号和声音感性形式的文学语言，是靠内容化的语义、结构、韵律、节奏来唤起读者的感受、想象、认识和经验的；再如运用结构、形象、时空、虚实、疏密、情景、意境……等艺术手法，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文学世界，同时也就创造了文学的思想内容，这就是文学作品形式美的功能。所以历来把文学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界定为文学作品的内容要素；把语言、结构、体裁规定为文学作品的形式

要素，都是忽略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同一性”和“不可分离性”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忽视了文学内容和形式在一定情况下是会互相转化的特点。只强调分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抽象地探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更有甚者把它们割裂、孤立起来进行分析和概括，如段意清楚、主题正确、结构谨严、语言简洁生动、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动人、情景交融、意境深邃……，用这些公式化的条条框框和抽象、概念化的陈词套语来代替具体的艺术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然，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法，决不仅限于本书所讨论的内容，限于篇幅，只好从略。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实践前面所谈到的指导思想：体现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理论联系中学古代文学教学实际，观点与材料的一致，试图内容有所更新。但限于客观条件和笔者的水平，还难于完全做到，不过，这永远是笔者所努力的方向。

关于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分析法”的研究，迄今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编写这样一本书，实际上是极不成熟而大胆的尝试。由于编写时间短促，更限于笔者的水平，肯定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期待方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及中文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孟传书教授、高梅森校长在百忙中为本书审阅初稿，给予肯定评价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章桂英同志为本书抄写并核订书稿和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承蒙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的领导大力指导和支持。为此在这里对上述领导、朋友、同

志们的指导、关怀、鼓励和帮助，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提出某些见解的同时，为努力反映我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水平和成果，曾参考了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引述、采用、吸取了它们一些研究材料、观点和成果，或未能一一注出，非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谨此说明，并致谢意。

编著者

1991.8.28 于大连

目 录

前 言

一、知人论世在中国古代文学分析中的作用·····	1
二、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与形式美的分析·····	44
三、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艺术的分析·····	59
四、中国古代文学篇章结构的分析·····	93
五、中国古代文学时空艺术的分析·····	120
六、中国古代文学疏密艺术风格的分析·····	132
七、中国古代文学虚实艺术的分析·····	144
八、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景、意境分析·····	167
九、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208
附：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分析·····	273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以下只称“古代文学”）的分析，必须建筑在“识字”和“通读”的基础上。读不懂古代文学作品，妄谈分析和鉴赏。对古代文学作品语言文字的诠释不同，便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赏析。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知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些文学作品是古代的，必须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必须具有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还原于历史现实具体形象的能力，因为只有通过语言文字的桥梁才能达到作者创作时代的彼岸。

又因为鉴赏主体是中学生，他们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文化知识还很短缺、单薄；鉴赏对象又是古代文学作品，这便与一般文艺鉴赏不同，在鉴赏之前，除通过阅读掌握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客观分析的环节，这是由于鉴赏主体和鉴赏对象所决定的。分析作品是阅读和鉴赏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分析既不同于阅读，也不同于鉴赏，分析与鉴赏的区别，更是微妙。鉴赏作品主要是读者的审美观念在起作用，由鉴赏主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观念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这中间就已经有了分析。而分析作品必须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如果说，鉴赏是主观的、激情冲动的，那么，分析就需要客观和冷静，尽量减少读者的主观成分，即不可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强加给作者和作品。因此，分析应是在阅读的基础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进行欣赏和评价。但分析绝不等同于欣赏；同样，鉴赏虽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作品，但它又不

能取代分析。对简单的直观的艺术来说，阅读、观看与欣赏、批评之间的分析过程，常容易被忽略，好象是产生“一见钟情”的直接效果。但对语言艺术来说，无论古今，不管自觉不自觉，阅读和鉴赏之间的分析过程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应忽略的。当读者把作品中的语言符号所构成的文学作品在自己头脑中又复原为具体的艺术形象时，实际上是经过分析、综合而达到的。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中学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法。

一、知人论世在中国古代文学分析中的作用

(一) 知人论世、具体分析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纯客观的对现实的照像、翻版，它必然染上作家的主观色彩。作家受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任何一部（篇）作品都与作者的“人”和他所处的“世”密切相关。

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代作家依照他对自己的时代、社会生活的认识而创作出来的。当代读者应该了解、认识这一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也就是分析它的主题、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

历史唯物论要求认识客观事物，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更应该知人论世。因此，必须了解作家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即使同时代的作家，他们也有不同的遭遇、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同时，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随着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而变化着，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差异。诚如孟子说：

·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万章下》）。

清代顾震说：

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以意逆志说》）

鲁迅先生也曾说：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知人论世”，有着广泛、坚实的客观基础，因为它植根于社会和生活实践。“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其人。作者与作品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作者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阅历、修养等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产生和作品风格的形成。只有了解作者其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分析他的作品；如不知其人，就难于对作品求得透彻的理解。

要“知其人”，又须“论其世”，就是要了解作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它们对作者、作品的影响。把作者与其所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中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自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清吴淇在《六朝诗选定论缘起》中说：

故人必与世相关也，……苟不论其世为何世，安知其人为何人乎？

因此，分析古代文学作品要“知人论世”，方能作出历史的评价。如在原中学语文课本中共选入《孟子》散文五

篇，不可谓不多。分析《孟子》散文，首先要分析它的论辩艺术特征，这必定有它的时代特点和作者的具体条件做基础。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各阶级、阶层发生了多角矛盾。首先是：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在这样的时代，却“祖述唐虞三代之德，述仲尼之意。”（同上）把希望寄托在齐宣王、梁惠王等已经腐朽了的奴隶主贵族身上，一再提倡“保民而王”的“仁政”，这是不合时宜的，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同上）。这就不能不逼得他进行两方面的斗争：其一是驳詰处士横议；其二是游说各国卿相。很清楚，是他的时代和处境提供了形成他的雄辩艺术风格的条件。所以当他的弟子公都子问他：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回答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同时，他在同各家的论辩中，到各国游说时，互相攻击辩难，又相互借鉴吸收，给了他许多启发和提示，培养和激发了他的论辩、游说的能力和激情，从而写出很多论辩艺术性很强的文章。

在上述时代和孟子具体处境的前提下，形成《孟子》散文论辩艺术风格的基础是志、气、言的辩证统一而构成的“浩然之气”。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集义养气，是孟子的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这就是说，不讲孟子“集义养气”的功夫，是理解不到《孟子》文章之精神的。关于“集义养气”，孟子自己有过明确、深刻的解释：

（孟子）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

（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公孙丑问）：“何谓知言？”

（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知言”，是指具有辨别言辞的能力，如对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知其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养气”则指内心的道德修养功夫，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孟子为实现“仁政”理想而要求个体所必备的一种奋发无畏、积极向上的状态。这种修养须“配义与道”、“集义所生”，通过刻苦自励，使之达于“至大至刚”的理想境界，这就是

善养“浩然之气”。“知言”和“养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辨别言辞好坏的能力，必须依赖于道德思想修养方面的高低，这种修养的加强，自然有助于识别言辞能力的提高。孟子是把“养气”作为“知言”的基础来谈的，善养“浩然之气”，就能更好的“知言”。重要的是把思想修养与鉴别言辞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孟子说：“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朱熹注云：

壹，专一也。孟子言志之所向专一；则气固从之，然气之所在专一，则志亦反为之动。

这说明“志”和“气”也是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气”就是“正义”培养起来的“正义感”，在专一、高尚的思想意志指导下得以发挥，使之更加强烈，因而理直气壮、感情充沛，这就在表达时形成语言上的一种气势、一种激情。任何诡辞、淫辞、邪辞、遁辞都会被这种气势所冲决。而“言”（文）又用以载“志”（道）。这就是孟子的“集义养气”功夫在论辩中所形成的“志”、“气”、“言”的辩证统一、互为影响的关系，构成《孟子》散文论辩艺术风格中的浩大气势。这样，孟子就把“气”的概念引进了语言、文学的领地，使“气”获得文学上和美学上的意义，并对文学批评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曹丕的“文气”说，刘勰的“务盈守气”，韩愈的“气盛言宣”，苏轼的“文者，气之所形。”“气”由此成了贯穿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概念，逐渐成为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美学概念一个独特的文艺理论的表述形式。

对于《孟子》散文论辩艺术风格中的浩大气势，扬雄在《法言》中说：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闢之，廓如也。

可见《孟子》文章的论辩威力是很强的，这是因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除“距杨墨”的具体目的外，便是宣扬“王道”，鼓吹“仁政”，强调“民本思想”。这在《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中可见一斑。该文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孟子说服齐宣王放弃“霸道”而实行“仁政”的言论。说明“欲王天下”，必须“保民”；“保民”的思想基础则在于有“不忍之心”才能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这是孟子的经济、政治纲领，也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要使学生深刻地领悟它，就必须“知人论世”。

孟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的中期，其社会状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已经进行了概括（见前），具体说，当时是七雄并峙，兼并成风，战争频繁，生产被严重破坏，弄得民不聊生，所谓：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孟子·梁惠王上》）。

人民处在战争攻伐，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统治阶级更加重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当时如果能避免战争和过度的剥削带给人民的痛苦，则是人民最热切的愿望。那么，我们如果抛开“王道”、“仁政”的阶级内容——孟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争取（利用）人民拥护以达到“王天下”的目的——但，不管怎样，孟子提倡“保民”，反对“罔民”；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至于